

【共和国记忆丛书】

新中国高考

高军峰 姚润田 编著

史

福建人民出版社

【共和国记忆丛书】

新中国高考

高军峰 姚润田 编著
福建人民出版社

史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新中国高考史/高军峰, 姚润田著. —福州: 福建人民出版社, 2009. 3

ISBN 978-7-211-05891-4

I. 新... II. ①高...②姚... III. 高等学校—入学考试—教育史—中国—现代 IV. G649.2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207908 号

新中国高考史

XINZHONGGUO GAOKAO SHI

作 者: 高军峰 姚润田

责任编辑: 陈 姝

出版发行: 福建人民出版社 电 话: 0591-87533169 (发行部)

网 址: <http://www.fjpph.com> 电子邮箱: 211@fjpph.com

地 址: 福州市东水路 76 号 邮政编码: 350001

印 刷: 福建省天一屏山印务有限公司

地 址: 福州市铜盘路 278 号 邮政编码: 350003

开 本: 787 毫米×1092 毫米 1/16

印 张: 19.375

字 数: 294 千字

版 次: 2009 年 3 月第 1 版 2009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2000

书 号: ISBN 978-7-211-05891-4

定 价: 37.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直接向承印厂调换。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目 录

第一章 新高考制度的确立	1
一、新中国建立前的高考状况	1
二、新中国建立后对高考的统一管理	5
三、联合招考	12
四、院系的初步调整	19
五、统一高考制度的确立	24
第二章 高考模式的定型和发展	30
一、按专业培养人才	30
二、高考模式的改进	40
三、第一个高峰	50
第三章 高考的反复	57
一、教育方针的转变	57
二、统一招生的取消	63
三、教育“大跃进”	69
四、恢复统一高考	83
第四章 调整时期的高考	96
一、“高教六十条”	96

二、调整前期的高考·····	105
三、教育指导思想转变·····	115
四、调整后期的高考·····	122
第五章 “文化大革命”对高考的冲击·····	133
一、取消统一高考·····	133
二、“教育革命”·····	141
三、大学试点招生·····	150
四、围绕高校招生的斗争·····	158
五、教育“反回潮”·····	170
六、突破“两个估计”的努力·····	175
第六章 高考的恢复和发展·····	188
一、邓小平与恢复高考·····	188
二、高考的“1977年”·····	201
三、高考的进一步恢复和发展·····	210
四、高考改革的起步·····	221
第七章 高考改革的探索·····	234
一、改革中的高考·····	234
二、标准化考试·····	244
三、高中毕业会考制度的确立·····	256
四、高考新模式的探索·····	266
结束语·····	295
主要参考文献·····	300
后 记·····	306

第一章 新高考制度的确立

新中国成立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新政府在教育方面确立了全新的制度，高考制度是其中之一。作为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的重要衔接，全国统一高考制度成为国家人才培养和选拔的重要形式，并在实践中逐渐步入制度化和规范化阶段。全国统一高考制度是我国现代教育发展史上的一个创举。

全国统一高考制度的建立与当时的政治经济形势密不可分。建国伊始，中国共产党在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各方面都进行了根本性变革，在教育领域则按照“改造旧教育，建设新教育”的方针对旧的高考制度进行了必要的继承、扬弃与变革。新中国建立以前，我国各级各类教育发展极不平衡，教育层次、布局和内容都不能适应新时期的需要，主要表现为基础教育难以满足高等教育的生源需求，广大工农子弟没有接受教育的机会。因此，新中国对旧的教育内容、学制和教育管理体制等各方面都进行了改革，实现了对高考的统一管理，以满足全国范围内各方面、各行业建设对人才的迫切需要。新中国统一高考制度的确立，使中国的教育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发展阶段。

一、新中国建立前的高考状况

高考是随着现代教育制度的确立而出现的，而现代教育制度是以学校的教育制度为核心的。学校的教育制度规定了各级各类学校的任务、招生形式、入学条件和学业年限以及层次等。我国现代学校教育制度的建立，依据的是北洋政府教育部制定的“壬戌学制”。它把高等教育分为大学校、高等专科和大学院三级。由于全国的高校层次和规模差异很大，用统一方式招考难度很大，因此对招考方式没有多加限制，各高校实施单独招考，形式灵活多样。在单独招考过程中，名校的标准较高，招考严格。而普通高校中有不少则因生源问题降低了

标准（尤其是对同等学力的标准要求各异）。因考试内容的差异，自主招生一方面给中学教学带来很大困难；另一方面也造成了文、理学科人才严重失衡的后果，使文科学生大量失业。1928年，全国高等学校学生数 25198 人，其中文科学生数占 73%，理科类占 27%；1930 年，全国高等学校学生数 37566 人，文、理科学生数分别占 75% 和 25%。^①应该说，这一时期的高校自主招生形式对于某些地区是有利的，但对于落后地区来说，则使一些学生丧失了入学机会。

为克服单独招考的种种弊端，1933 年 5 月，当时的南京国民政府教育部颁布实施高等学校招生办法，要求各高校以学院为单位按比例招生，同时又限制了文科类的招生人数。1935 年实施学科限额招生，1937 年在某些高校试行联合招生。实施按比例招生的办法平衡了高等学校文、理科的学生数量比例。据统计，1933 年全国高等学校学生数为 42936 人，其中文、理科学生比例分别为 67% 和 33%。而到 1937 年，该比例分别为 48.8% 和 51.2%。^②1938 年 6 月，在国统区实行统一招考，由招生区统一命题招考。1939 年，由国民政府教育部统一命题进行招考（沦陷区仍为自主招生）。1941 年，随着抗战形势的发展，统一招考被迫中止。这样，到 1949 年为止，南京国民政府教育部规定的高校招考方式主要有单独招考、联合招考、委托培养和推荐免试等。

在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解放区和各根据地设立了一些高校，主要有 1936 年成立的中国抗日红军大学（1937 年改名为中国抗日军政大学）、1937 年成立的陕北公学、1938 年成立的鲁迅艺术学院（1940 年改名为鲁迅艺术文学院）、1939 年成立的中国女子大学、1940 年成立的中国医科大学、1941 年成立的延安大学等。各高校实行自主招生，生源主要是来自各部队的干部和涌入解放区的知识青年。这些高校既为根据地建设培养了急需的技术人才、大量的文学艺术人才，也为革命事业培养了大批政工干部。虽然由于当时战争环境的影响，这些高校难以实施统一的招考，但它们根据具体情况扩大了招生范围，放宽了工农子弟的入学资格，使工农子弟更多地获得了接

^{①②} 房列曙主编：《中国历史上的人才选拔制度》，人民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597 页。

受高等教育的机会。

在全国解放战争时期，由于战场上节节败退，国民党于1948年9月要求各高校陆续南迁。但是由于国民政府并不能妥善解决南迁高校师生的生活开支等问题，致使一些南迁的高校师生备受颠沛流离之苦。如置学生生命安全于不顾，强令长春大学在解放军围困长春时南迁，迁到北平不久又迁往天津。至1949年初，流落到北平的高校师生约有21000人。国民政府教育部南迁广州，使得南迁苏州的河南大学到1949年春季开学时尚未领到2月份的政府拨款，学校仅存三天之粮，不得不向县府借粮千担应急。^①于是，南迁的高校大多数又很快迁回原址。解放区人民政府对其进行了接收，特别是对师生的生活进行了妥善安置。

1949年，国统区物资紧缺、物价飞涨、社会秩序混乱。随着南迁公职人员的增多，南迁的高校师生处境越来越恶劣。值得特别说明的是，平津地区的高校拒绝南迁，师生共同护校，以迎解放军接管。例如北京大学，除校长胡适和图书馆馆长毛子水等少数人飞离北平外，广大师生和市民一起于1月31日参加了欢迎解放军入城仪式。^②这里需要说到城市中的教会学校。“在1949年节节胜利的解放军因严守纪律，爱护人民财产而备受称颂，教会的礼拜堂和学校即使在占领时期有时居然可以继续工作。”^③许多教会学校的学生参加解放区的革命大学，经过培训成为革命干部，为革命和以后的建设作出了贡献。

随着解放战争向南推进，解放区政府接管了越来越多的大学。这些学校门类各异，有国立的，有私立的，也有教会的。当时中国高等学校共有205所，专任教师1.6万人，学生11.7万人；中等学校5216所，学生126.8万人，专任教师8.3万人。^④这些学校学制不

① 张仁善著：《1949中国社会》，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254页。

② 王效挺、黄文一主编：《战斗在北大的共产党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621页。

③ [美]杰西·格·卢茨著，曾钜生译：《中国教会大学史（1850—1950）》，浙江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第422页。

④ 《中国教育年鉴（1949—1981）》，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4年版，第79页。

同、课程不同、专业不同、管理不同。为了保证高等教育的连续性，解放区政府对辖区的各级学校采取了“维持现状，立即开学”的方针，实行了“接而不管”的政策。所以1949年高等学校开始大规模招生时，解放区的部分国立高校采取的招生方式是联合招生，而其他学校采取的则是自主招生。

1949年，迅速发展的革命形势需要大量的革命干部。有些解放区的大学不得不采用短期培训的方式选拔培养干部，随时招生，就地培训。华北地区的华北人民革命大学于1949年2月11日在《人民日报》上刊登《招生简章》，明确指出：“全国解放在望，为了进行改革和建设新中国，迫切需要大量的革命干部与建设人才。”革命大学第一期招生多达12000人，呈现出培训规模大、学习时间短等特点。

东北解放区人民政府鉴于高等学校存在与中等学校界限不清、招生不按规定、学生文化程度低、教师质量差、学校制度不统一和各自为政等问题，认为短期培训班形式已不能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再者，全国即将解放，全面建设时期即将来临，社会必然需要大量各方面人才，所以建立正规学校教育体制势在必行。1949年8月1日，中共中央东北局、东北行政委员会发布《关于整顿高等教育的决定》，对高等学校进行整顿，通过实现对高校的规范化管理，以适应培养各种人才的需要，规定“建立正规教育制度，确定学制，工农医学院四年毕业，社会科学及文艺学院三年至四年毕业，专科修二年毕业；哈工大可招收预科生外，一律不准招收预科新生；除哈工大和大连大学外，今年暑假一律不招新生”^①。

1948年11月，东北地区全境解放。有些院校即在1949年初开始招生，其中就有哈尔滨工业大学和大连大学。从哈尔滨工业大学1949年公布的招收大学本科和预科的招生简章看，其招生对象和标准如下：（1）愿为新民主主义建设事业服务之青年，不分民族和性别；（2）年龄：本科19岁至30岁，预科17岁至25岁；（3）身体健康，无不良嗜好与传染病者；（4）文化程度：投考本科者，限高级中学毕业或同等学力者，能用俄语听懂各种专业课。^②大连大学的投考

① 《新华月报》，1949年第1卷第1期，第211页。

② 《东北日报》，1949年8月4日。

条件是：“凡高中毕业或具有同等学力持有相当证明文件之男女青年，年龄未满二十四岁者。”^① 另外，与哈尔滨工业大学招生方面不同的还有：考试科目不包括外语；交300元报名费；文化课考试合格后要进行体检。从招生地点看，哈尔滨工业大学在长春和北平招收预科生，大连大学在北平和上海招生。^②

已经解放的上海市，对国立大学和专科学校的招生都设立了招生委员会。上海市16所高校设立统一的招生委员会，考试科目与华北地区相比，外语考试中除俄语和英语外，增加了一门德语，采用统一的试卷进行考试，参加考试的人数是10384人，报考工学院的有4283人，报考医学院的为1504人，报考管理学院的1050人，报考法学院的221人，报考政治系的62人。^③ 在华北地区，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南开大学三所大学和北平师范大学、北洋大学两所大学分别采取了联合招生的方式。^④

因此，在1949年，除解放区的部分国立高校实行联合招生外（外地考生委托外地高校代为招生），全国其他高校大都实行了自主招生。1949年，公私立高等学校共招生30500人，其中工科10800人，农科2100人，林科200多人，医科3800多人，师范3400多人，文科2900多人，理科1800多人，财经4600多人，政法200多人，体育50多人，艺术200多人。^⑤

二、新中国建立后对高考的统一管理

新中国成立后，对于接管的全国各级各类学校如何实施有效的管理，如何实现“改造旧教育，建设新教育”的目标，使之服务于新中国的各方面建设，对于新生的人民政权来说是一个全新的课题。同时，高等学校的招考作为衔接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的关键环节，承载着为国家选拔人才的任务。它对基础教育发展的推动作用显而易见

① 《人民日报》，1949年7月13日。

② 〔日〕大冢丰著：《现代中国高等教育的形成》，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50页。

③ 《解放日报》，1949年7月27日、8月12日。

④ 《人民日报》，1949年7月20日。

⑤ 杨学为总主编：《中国考试史文献集成》第8卷，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290页。

的，也体现了教育平等和社会公平的内涵和特征。为此，要求教育部门必须对全国各级教育加强统一管理。

首先，确立新的教育方针，改革教育内容，规范高考的科目。早在中共七大上，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的报告中谈到新民主主义的教育方针时就指出：“中国国民文化和国民教育的宗旨，应当是新民主主义的；就是说，中国应当建立自己的民族的、科学的、人民大众的新文化和新教育。”^① 1949年1月6日至8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讲话又指出：“1949年的国民教育计划（大学教育，中学教育，小学教育和成人补习教育）必须适合当前革命形势和革命任务的需要。”^② 这说明随着全国革命胜利形势的到来，各级学校的教育工作的任务非常明确，即要满足各行业对专门人才的需求。

但是，随着解放区的扩大，接管的各级学校数量的增多，如何对接管的各级各类学校实施改造就被提上了工作日程。1949年3月14日，北平军管会在北平饭店召开“大学教育座谈会”，邀请文化教育界的知名人士马叙伦、范文澜、茅盾、沙千里、许广平等讨论大学教育的改革问题。大家提出了一系列的建议：教育服从于政治；取消党义、神学课程；大学要由国家统一计划管理；学制要改革；取缔私立学校等。^③ 这次座谈会对于大学教育改革的内容进行了有益的探讨，为新中国确立新的教育方针提供了思想准备。

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文化教育为新民主主义的，即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教育。人民政府的文化教育工作，应以提高人民文化水平，培养国家建设人才，肃清封建的、买办的、法西斯主义的思想，发展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为主要任务。”^④ 如何部署、落实教育方针在建国初期是一项艰巨的任

①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1084页。

② 《毛泽东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34页。

③ 毛礼锐、沈灌群主编：《中国教育通史》第6卷，山东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34页。

④ 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编：《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大事记（1949—1982）》，教育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3页。

务。当时国民中80%以上的人是文盲，学龄儿童入学率仅20%左右。按当时全国人口4.7亿计算，平均每万人中仅有高等学校学生3人，中等学校学生38人，小学生486人，^①并且大部分学校在新解放区。如何在新的教育方针的指导下接管和改造这些学校，使之服务于新中国建设，已是教育工作的当务之急。

1949年10月19日，中央人民政府任命马叙伦为教育部部长，钱俊瑞为副部长。1949年12月23日，教育部在北京召开第一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教育部部长马叙伦在开幕式上讲话指出：“对于旧教育不能不作根本的改革，而这种改革正如我们的共同纲领所规定，必须有计划有步骤地来进行。这样，在我们面前就发生了一系列的问题，如全国教育的制度，各级学校的课程、教材、教学方法、师资等等，都要求一个彻底的，同时有计划、有步骤的变革和解决。”^②

新中国教育部制定和实施的新教育发展方针，其目的不但是为了改造旧教育，建设新教育，而且也是为了更公平、更有效率地在全国选拔各种专门人才。原有的教育内容和课程安排、学制和管理体制已不能满足新中国建设对人才的大量需求，所以必须改革以往的各级学校课程安排，取消国民党在学校开设的党义、公民、童子军等党化教材和课程，并对课程安排方面沿袭外国的做法，特别是学非所用的东西加以删除。当时平民教育家晏阳初对这些“全盘西化”的教育有独到的研究，归之为“无教”和“误教”。“无教”者，80%的人口是文盲也；而少数受教育的人是学非所用，用非所学，则是“误教”。国家需要大量的人才，但“无教”和“误教”却导致许多学生失业。^③所学课程无用并且不统一，教育的对象又有限，这是对教育资源的极大浪费。

① 《中国教育年鉴（1949—1981）》总述，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4年版。

② 《马叙伦部长在第一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的开幕词》（1949年12月23日），见《中国教育年鉴（1949—1981）》，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4年版，第683页。

③ 宋恩荣编：《晏阳初文集》，教育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170页。

建国初期，高校实行自主招考，由于在课程设置方面各自为政，不能为培养国家建设需要的各种人才提供有效的支持。因此课程改革成为改造旧教育、建设新教育的重要步骤。

高校的单独招考直接影响着中小学课程的设置。现实要求国家教育部门必须以教材的统一规划和编订为契机，尽快实现对基础教育课程设置的统一管理。1949年10月19日，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陆定一在全国新华书店工作会议上致闭幕词时指出：“教科书要由全国办，因为必须如此，教科书的内容才能符合国家政策，而且技术上可能印刷得好些，价钱也便宜些，发行也免得浪费。”“教科书对于国计民生，影响特别巨大，所以非国营不可。”^①很快，基础教育实现了对课程设置的教材编订的统一管理，为以后高考实行统一的科目设置提供了前提。

针对高校的课程设置和高等教育改造方针问题，1949年11月17日，教育部召开华北区及京津19所高等院校负责人会议。教育部副部长钱俊瑞指出：“高等教育改造的方向是一切服务于国家建设，特别是经济建设；当前课程改革的中心环节，是加强政治课的学习，业务课程必须切合建设的需要。”^②在新的教育方针的指导下，改革和规范各级学校的课程，既适应了为国家建设培养人才的需要，又为加强对高考的统一管理提供了条件。

其次，学制的改革促使了教育平等和高考社会公平的实现。新中国的政权性质决定了在新的教育制度下必须最大程度地给工农子弟提供受教育的机会。鉴于80%的人口是文盲的现状，毛泽东指出：“从百分之八十的人口扫除文盲，是新中国的一项重要工作。”^③因此，在改造旧教育的同时，就开始着手开展全国范围的扫盲运动，尤其是建立了工农速成中学和各种培训班等，以提高工农成分人员的文化素质。

① 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编：《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大事记（1949—1982）》，教育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5页。

② 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编：《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大事记（1949—1982）》，教育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6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1083页。

1949年，全国各地参加冬学运动的农民达1000余万人。在城市，职工教育迅速开展，东北地区参加学习的职工达32万人，北京市参加学习的职工和干部3万多人。^① 为了扩大各级学校学生的工农成分，各地开工农速成中学，大力开展工农群众的业余教育。周恩来早在1949年5月9日北京大学教授联谊会举行的第一次座谈会上就讲话指出：“新民主主义的教育，要为人民的服务，要从广大人民中培养大量人才。”^②

1949年12月23日，第一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教育部部长马叙伦就“教育向工农开门”问题指出：“由于我们的国家是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因此，我们的教育也应该以工农为主体，应该特别着重工农大众的文化教育、政治教育和技术教育。”“我们的中学校 and 大学校也应该有计划、有步骤地为工农青年大开门，以期大量的培养工农出身的新型的知识分子，作为我们国家建设的新型的坚强骨干。”^③

1950年6月1日至9日，教育部组织召开第一次全国高等教育会议，教育部部长马叙伦说：“高等学校应该准备和开始吸收工农干部和工农青年，以培养工农出身的新型知识分子。”^④ 会议期间，周恩来讲话指出：“我们的教育是大众的，是为人民服务的，这是我们教育的方向。”“过去如果不是封建地主或资产阶级的子弟，是很少有机会受大学教育的。即使在今天，大学学生的成分也还是没有什么变化。这种情况不符合我们新民主主义教育方针的要求。”^⑤

① 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编：《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大事记（1949—1982）》，教育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6、9页。

② 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编：《周恩来教育文选》，教育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2—3页。

③ 《马叙伦部长在第一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的开幕词》（1949年12月23日），见《中国教育年鉴（1949—1981）》，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4年版，第683页。

④ 苏东海、方孔木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风云实录》（上），河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48页。

⑤ 《周恩来在全国高等教育会议上的讲话》（1950年6月8日），见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编：《周恩来教育文选》，教育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5页。

值得关注的是,新建的人民革命大学,各种专修班和培训班、速成班、补习班并没有纳入教育部统一管理的轨道,在制度上也没有给这些办学机构以应有的地位,严重影响了国家对专门人才的选拔。工农人员虽然能够通过各种形式接受教育了,但由于没有统一的学历标准,难以正常进入高校深造。1951年5月下旬,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召开了第四次全体委员会议,研讨了教育部提出的学制改革方案,批准了《关于改革学制的决定(草案)》。1951年10月1日,政务院正式颁布了《关于改革学制的决定》,指出:“我国原有学制有许多缺点,其中最重要的,是工人、农民的干部学校和各种补习学校和训练班,在学校系统中没有应有的地位……”对于中等教育,新学制规定:“实施中等教育的学校为各种中等学校,即中学、工农速成中学、业余中学和中等专业学校。”对于高等教育,新学制明确规定:“实施高等教育的学校为各种高等学校,即大学、专门学院和专科学校。……大学、专门学院修业年限为三至五年,专科学校修业年限为二至三年,师范学校修业年限为四年,入学年龄不作统一规定。”^①

1951年10月3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为什么必须改革学制》,指出:“新学制将完全革除旧学制的弊害……无疑地将便于推进新中国的人民教育事业,便于提高我国人民的文化和科学水平,便于大量培养我国各项建设事业所需要的人才。”“在旧学制之下,居于社会生产中的重要地位的劳动人民反而是受排斥的,社会生产的活动和各种实际需要在学校教育中得不到充分的表现,教育和实际生活常常是距离得很远的。”

新学制为了适应国家对各种人才的需要,规定了各种技术学校的地位和制度,规定了各种速成中学和培训班的地位和制度,规定了大学和专门学院的地位和制度。总之,新学制把新设立的各级各类学校的地位和管理制度都给予明确规定,用制度的形式把这些学校纳入规范化的国民教育管理体系。另外,为了保证干部有受教育的机会,新学制对各级政治训练班的地位和制度也加以规定。

第三,加强对教育的统一管理,为实现高考的统一管理提供制度

^① 《中国教育年鉴(1949—1981)》,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4年版,第686页。

保证。在教育部落实高校课程和学制改革时，并不是所有人都能理解和支持的。一位湖南教师在给《人民教育》杂志的来信中说：“建设新教育和改造旧教育的关系，在我们这里引起了一种怀疑，因为有人这样提出：我们的教育路线是双轨制；‘改造旧教育，建设新教育’，有人不同意。这样的提法到底对不对呢？我们今后的教育是否还应继续双轨制呢？改造旧教育，建设新教育，应该如何理解呢？”为了解答这类疑问，《人民教育》在这年第二期专门开设了“问题解答”栏目，其中说道：“目前中国教育建设工作中出现了两种情况，决定了两种工作的任务：第一，如何把这些已经是新民主主义的新教育建立和巩固起来的任务；第二，原有的中、小、大学过去执行的方针、制度、课程、教材及教师的思想、立场、作风，都不适合今天人民的要求了。”

为了消除人们对教育改造的困惑，使教育在改造的过程中实现规范化的统一管理，1950年5月5日，政务院颁布了《各大行政区高等学校管理暂行办法》，规定“全国高等学校除华北区高等学校由教育部直接领导外，其他各大区高等学校暂由各大行政区教育部或文教部代表教育部领导”，^①明确了教育部与各大行政区教育部门、高等学校的关系，以避免改造中出现混乱现象。但此时全国高等学校的性质和管理方式依然多样化，改造任务艰巨，加强对全国高校的统一管理只能采用渐进的方式。1950年6月1日至9日，教育部召开了第一次全国高等教育会议。经过讨论，大会一致通过了《高等学校暂行规则》、《关于实施高等学校课程改革的决定》等五项草案，并上报教育部批准。这次会议为高等学校的管理体制、课程与学制，高等学校的任务等作出了明确的指示。依据这次会议的决定，6月24日，教育部颁布了《高等学校校历》；7月5日，教育部、出版总署联合下发《一九五〇年秋季中小学教科书用书表》，以解决各地中小学教科书版本不一、供应混乱的问题；8月2日，政务院通过了《关于高等学校领导关系问题的决定》和《关于实施高等学校课程改革的决定》，规定了教育部和高等学校的行政关系，高等学校的课程设置、修业年

^① 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编：《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大事记（1949—1982）》，教育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17页。

限；对于私立学校，8月14日，教育部公布了政务院批准的《私立高等学校管理暂行办法》，明确规定“私立高等学校的行政权、财政权及财产所有权均应由中国人掌握”。^①

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西方国家随即断绝了对中国大陆教会学校的经济资助。我国教育部门开始接办教会学校，收回教育主权。如1950年10月12日，教育部明令接办辅仁大学。12月29日，政务院通过了《接受外国津贴外资经营之文化教育救济机关及宗教团体登记条例》。据1950年底统计，全国接受外国津贴的高等学校共20所（不包括辅仁大学），共有学生14536人，教职员3491人，工警1943人。其中接受美国津贴的17所，学生12984人，教职员2940人，工警1879人。^②对于接管的教会学校，一部分改为国立学校，一部分改为私立学校，进一步加强对全国教育的管理。经过改革，全国各级学校的统一集中管理格局初步形成。统一校历、课程、学制，不但使各级教育被纳入国家计划的轨道，而且也为教育部门加强对高校招考的统一管理提供了制度保证。

三、联合招考

如前所说，尽管教育部加强了对全国高等学校的统一管理，但是面对全国高校性质和管理方式多样化的局面，教育改造只能采用渐进的方式来进行。

1950年5月26日，教育部发出《关于高等学校一九五〇年暑期招收新生的规定》，确定了统一考试的日期和考试科目以及发榜日期。相对于1949年，这次招考的方式主要是“联合招生”。华北地区的录取人数由教育部规定，其他高校由各大行政区统一规定，但部分高校如中国人民大学、人民革命大学、军政大学的招生仍单独进行。1950年的联合招考呈现以下几个特点：

其一，招考的统一性明显加强。依据《教育部关于高等学校一九五〇年暑期招收新生的规定》，首先是统一报名资格。凡志愿为人民

^① 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编：《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大事记（1949—1982）》，教育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26页。

^② 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编：《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大事记（1949—1982）》，教育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31页。